

Doi:10.11835/j.issn.1008-5831.gg.2019.02.003

欢迎按以下格式引用:张彦,赵馨姝.马克思主义域阙下《黑镜》的后人类症候考论——以基因编辑婴儿为切入视角[J].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4):10-21.

Citation Format: ZHANG Yan,ZHAO Xinsu. The post-human syndrome of Black Mirror from Marxist perspective: A viewpoint of gene-edited infants [J].Journal of Chongqing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 Edition),2019(4):10-21.

马克思主义域阙下《黑镜》的 后人类症候考论

——以基因编辑婴儿为切入视角

张彦,赵馨姝

(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浙江 杭州 310028)

摘要:贺建奎基因编辑婴儿事件一石激起千层浪,引发了媒体和海内外各界人士的高度关注,这些质疑普遍出于对人类未来的哀思、聚焦于其对伦理道德和人类结构、社会秩序的突破和妨害等问题。笔者以此次事件为切入点,探讨事件爆发的深层原因,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分析科技与人结合的后人类主义表征、人类应当如何更好应对此类事件的继续发生、当后人类主义成为不可阻遏的趋势时人类应当如何调适。后人类主义以科技的发展为第一牵引力,对人的本体问题产生冲击。该理论涉及科学技术视域下的“人”的意识性以及人类肉体边界和自我认同的本体性问题,涵盖人类学、社会学、伦理学等领域。基因编辑婴儿事件的持续发酵,更提醒人类必须着手应对这一现实的、理论的难题,重新摹写“人”之本身。本文以《黑镜》的故事内核为主要研究对象,结合基因编辑事件,着眼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批判的维度,通过分析“你—它”关系的呈现和“祂—它”关系的呈现,阐述科技主体化、泛化的后人类社会特征以及后人类社会中主体意识和肉体的赛博格化特征,为应对后人类社会的到来、促成“我—它”关系的体现底线思维的有机实现提供视角和思路。

关键词:基因编辑;马克思主义;《黑镜》;后人类;赛博格;科学伦理

中图分类号:J905;A8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5831(2019)04-0010-12

近来一则基因编辑婴儿成功实验的新闻如一颗深水炸弹激起了国内外多学科专家强烈的齐声批评,引发了各界重大关切。科技发展能否突破人类伦理底线?2011年,英国迷你剧《黑镜》第一季正式播出,该剧以探讨科技对人类机体和意识的入侵为主题,在全球范围内围绕科技至上主义与人类未来

修回日期:2019-01-16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新发展理念的价值排序与中国实践研究”(18AKS010)

作者简介:张彦(1979—),女,法学博士,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和价值哲学研究;赵馨姝(1993—),女,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西方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研究。

命运,引发了广泛的讨论,在学术界也展开了论辩与争鸣。从马克思主义角度而言,《黑镜》高度关注人的生存境遇,从文艺批判的角度揭露并驳斥了资本主义社会科学至上突破人类伦理的发展方式,揭示了人类正在遭受以科技为显像的、资本操控下的一种日趋丧失个体主体性和个性的媒介化生存状况,洞悉人类即将遁入的赛博格化的生存状态,预示人类正在进入后人类时代的历史节点,这同当前基因编辑婴儿事件背后的人类生存忧思不谋而合。《黑镜》从20世纪的历史语境出发,批判地再现与解构现存资本社会唯科技主义的形态特征,预构人类可能的未来图景,逆向映射出人们沉溺于镜中那个虚幻的、自失的世界及其与现实世界的割裂。这不仅是对当下娱乐至死的资本社会消费主义的社会景观的抗议与批判,更展现出对人类现存境遇以及未来命运的忧虑。探析《黑镜》的现世讽喻价值,也是对贺建奎事件的探讨与回应。因为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社会批判和现实关照的价值旨趣来看,不论是根植于社会实践,反映和预测客观社会存在的艺术作品还是现世事件引发的忧虑与反思,它们所蕴涵的审美批判价值都为人类学和后人类主义的哲学思潮作出了生动的注脚,对人类步入“后人类的生存境遇”作出合理的预测与深刻反思。

一、“你—它”关系的呈现:后人类社会的外部性特征

基因编辑婴儿事件所引起的关于医学伦理、科技伦理、人类结构和社会秩序的担忧十分贴近《黑镜》对科技与人类未来的主题叙事。人类学是以研究人的生物性和文化性为对象的学科,回溯人类的起源、探寻人类的演进逻辑和方向。而“后人类主义基于新近的生物科学、空间技术、人工智能和虚拟现实技术等对人类在控制论和行为模式上的中心地位提出挑战”^[1]。由此看来,人类学是更为一般的后人类主义,后人类主义是人类学的具象研究领域,是人类学结合时代特征的发展模态之一。后人类主义是对崇尚人类理性和人类中心主义的人文主义的解构,从内底灼蚀人文主义的合法性,对人文主义的建构逻辑提出了是否合乎实践逻辑与理性逻辑的质询,并在尝试解构人文主义的话语谱系过程中完成对人文主义的扬弃。

为了论述方便,本文从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的角度出发,“你”指代与人类的“本我”相对应的宇宙、外太空等作为对象性存在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外部世界,“它”指代以硅原子作为存在形式的信息以及数字等内容。在此基础上,“你—它”关系的呈现就表现为外部世界如何被信息化和数字化的过程,这是后人类社会以及后人类主义的必要外部特征。在该类别中,科学技术的深入发展是外部世界被信息化以及数字化的最本质的决定性因素。

(一) 科技拜物教的原罪——“你”的数字化

早期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针对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科学技术的经济性质与意识形态性质展开了由经济到政治的深刻批判。以卢卡奇、葛兰西为主要代表人物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学派结合时代发展和社会实践,对以普列汉诺夫、考茨基等领导下的第二、第三共产国际的“正统”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决定论式的刻板印象和经济先验主义展开批判,但两派都立于马克思主义旗下,坚信自己对于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最符合马克思学说的本质。这种经济决定论调下宿命论和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的唯科技主义的双面辩证悖论成为资本社会科技拜物教反噬人类的潜在观念杀手,从这个角度也可瞥见基因编辑婴儿事件发生的历史理论之源。

正统马克思主义学派坚持在批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逻辑理路中实现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而马克思又是从发现和批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物化范式开始的,对基于实证理论的科学进行技术进行深入剖析并揭开了资本主义制度诉诸于“资本+技术”的方式导致个体主体性被吞噬的历史性秘密,逐渐形成马克思主义异化理论。这恰是建构《黑镜》后人类症候的理论基点,即外部世界的技术化呈现,异化理论同时也在某种程度上从市场经济的角度,解释了缘何旨在克服人类基因瑕疵的基因编辑婴儿试验引发了各方重大关切。意味着“超级人类”或后人类诞生的基因编辑婴儿成功试验通过对人类遗传物质不可逆转的改造或将宣告人类基因的被污染,这也是人类走向自我毁灭的代名词。上述人类未来发展趋势和更加详尽具体的后人类社会景观在十数年前的《黑镜》中就已呈现出来。

贺建奎基因编辑婴儿事件也确证了哈贝马斯所发现的,“技术的合理性”正在转化为“技术的拜物教”。技术拜物教现在看来同千百年来人类社会的伦理道德相抵牾,基因编辑而成的“超级人类”在生物性和文化性上同人类的异质以及由此带来的人类生命隐忧逆向确证了程序非正义的科技扩张对人类本体的蚕食。《黑镜》站在资本主义的角度宣示了隐匿于科技背后的资本更加隐蔽的存在方式,资本统合效率与覆盖面更加广泛多层,外部世界不可抗拒地转化为经过数字化信息技术加工处理之后的一个个毫无历史感的冰冷的硅原子,这是后人类主义的一大症候——科技对历史的倾颓消弭。

投射在这块人类社会的历史之境——黑镜上的,是人类面对势不可遏的科技进步与生产力发展所表现出的浑然不知、手足无措与羞羞答答的暧昧态度,甚至是对科技的盲目崇拜,这是招致人类走向自失、甚至自我毁灭的重要原因。这印证了德波的观点,为信息与数字席卷的外部世界和资本的渗透式发展正在完成资本对人类社会事无巨细式地与“弥散式”地同化与支配。伴随着“历史”经济维度的新景观的出现,人类社会走向后人类社会。

以手机及其衍生品为代表的科学技术用客观现实展现了后人类社会外部世界的数字化与信息化。科学技术的衍生品在《黑镜》中高频次出现:《急转直下》中,主人公们每天的生活工作无不依赖于手机评分系统,尤其是故事中涉及的“屏蔽功能”简直就是当下人们生活状态的一个反讽。无疑,手机在当下的重要价值早已不再局限于作为通讯工具的存在,外部世界在手机中得以信息化呈现,成为联结人类与外部世界的纽带与桥梁。科学技术为人类提供的这种全方位的便捷性,加剧了人类在思想和行为上的惰性,从而顺理成章地为技术植入人体甚或技术改写、摹写人类基因扫清了世俗和伦理阻碍,为人机同轨的多种形式觅求到某种合法性,这无疑是十分危险的行动逻辑。这也正是《黑镜》的远见所在,恰好回应了近来基因编辑婴儿试验在人伦上的危险性逻辑。

以手机、iPad等为代表的数字化、信息化的科学技术的爆炸式发展是联结此岸的人类与彼岸的后人类的桥梁与纽带,外部世界的初步全面数字化在这一时期只是朴素的、表层的,科技仍是人类的身外物而对人类维持着一定程度的克制。在科技发展的历史进程中,科学技术改造外部客观世界,甚至是改造人类自己的强大功效被奉为圭臬,并悄然获得其存在的合法性,一种新的“科技拜物教”快速扎根和发展。以科学技术为首要助推器的外部世界的数字化与信息化,既展现了人类逐渐失去自我、倾向于媒介化生存的现状,同时,外部世界的信息化与数字化也构成了后人类主义特征的最佳注脚。

(二) 科技类本质的异化——“你”的超数字化

基因编辑婴儿事件无疑是佐证外部世界超数字化的一个典型。人类失控地利用科技,最终在今天

突破了医学伦理和生命伦理的规训,将基因科技残忍地植入了人类自身,人类被对象化了,被数字化了,也就不再符合人类学对人类在生物性上的定义,不可遏止的科技扩张最终将人类逼到了角落。基于理论认识的知识型科学与直接作用于现实以改造存在的技术是一种基于共有性质的同质性范畴的两个方面,对象化的科学技术——作为一种“类”——走向人类对立面根源在于其主体性的获得或者人类主体性的丧失。首先,承认科技是导致人类异化的前提性因素,科技异化下的人类异化成为逆向推动科技异化(主体化)的能动性因素。因此,人的异化与科技的异化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共同对后人类的范畴建构形成合力,正如在基因编辑婴儿事件中,科技参与人类基因的编写所引发的人类生物性的污染和人类异化。其次,科技的主体性获得逐渐拥有支配人类肉体 and 灵魂的“自主能力”,异化科技塑造出的异化的“超级人类”随之也攫取了与人类相分庭抗礼的资格。科技是人类本体性存在的外部力量展示,是相对于“我”与“你”,即人类与外部世界的对象性关系,本应是人类改造外部世界、建构文明的工具性存在。但是,在后人类社会,人机同轨的“超级人类”“自主地”对外部世界从事改造工作,这就是外部世界的超信息化。据此,科技对外部世界和人类自身产生双重压迫,人类被迫进入后人类主义社会。

一方面,科学技术在获得其主体性中逐渐实现了外部世界的超数字化。科学技术发端之初,以人化物的形式出现,具有无意识且中立属性,其生命周期与处置权完全掌控于其创造者之手,科学技术的发展是人类自觉性的行为选择,设计初衷旨在通过改造客观世界而改善人类生存条件、优化生存环境,进而提升人类生存能力。人类在发现科学、创造技术中,不可避免地将人的因素和特质传递到科技,人类愈要掌控科技,科技的人化色彩愈浓。基因编辑婴儿改写人类基因密码,从而实现或增加了人类非生物性复制的可能性,逐渐实验人脑、模拟人格、复制意识,并逐渐在“灵魂-肉体-义体”中攫取了超越灵魂和道德的首要价值,人类扮演上帝角色的同时,科技借助人的力量实现了主体化。人格化、理性化的科学技术依据工具理性呈指数式增长,在科技本身的自我放逐中,实现了外部世界的超级智能化和超级机械化,具有一定低等级意识的科技的泛化挣脱了其造物主的规制,不计后果地盲目扩张,滑向了人类的对立面。

另一方面,外部世界的超数字化体现为异化的科学技术——超级科技——对人类社会的霸权,这种统制力是墨菲定律式的。科学技术的主体化之所以是一种异化,不仅由于其生成了违背其本质属性的低等级“意识形式”,更是由于科技异化之后果——正如贺建奎基因编辑婴儿之后果的不可预测性与不确定性。不难设想,以科学技术为载体,科技迅速规模化、纵深化数字化、信息化外部世界,并诉诸于世俗的手段不加甄别地批判现存世界,批判人类,批判一切自在的物体,科技因之获得了对人类社会的霸权。在冷冰冰的工具理性的排他性助推下,科技的类本质异化铸就了一个超数字化与信息化的外部世界,同时也实现了科学技术与一切自在物无可避免、无法挽回地遁入自我毁灭的绝境。正如《黑镜》第四季第五集《金属头》中“电子狗”对人类的无情斩杀,这个电子狗其实是一个符号性的存在和棱镜,散射出的是外部世界在超数字化、超信息化后,人类生存境遇的恶化图景。人类发展科学技术立意于自我救赎,却未曾想终归为工具理性所擒、陷入科技霸权、濒临自我毁灭。没有人能证明基因编辑后的“露露”和“娜娜”不会是那些“金属狗”,因为人类对基因的掌握程度仍十分有限,即使可以编辑某个基因,也并不能准确预测和追踪基因变异的全部后果。

二、“祂—它”关系的呈现:后人类社会中主体性的消解

人类通过基因编辑诞下人工的后人类婴儿,其基因经过人类科技改造提升后发育而成的新兴人类具有更加强大的能量,因此也称为“超级人类”。可以说,人类在利用柳叶刀塑造后人类的过程中扮演着上帝的角色,然而一个浅显的逻辑在于,拥有更强势的体能和智能的人类进化体——后人类如何可能甘愿屈服于人类?故而基因编辑婴儿的危险性就在于此——将引发人类主体性的消解。凯瑟琳·海勒在《我们何以成为后人类》一书中,着眼于维纳的控制理论,对信息化数字化时代的“身体”这个意象展开了关涉多角度、多学科的、鞭辟入里的分析,而“身体”也是人类学的研究重点之一。凯瑟琳认为,后人类“应然”的主体性存在是发端于、继承于“实然”属性上的人类和前人类的主体性中的存在,而后人类主义的存在又必将成为相较于人类和前人类的实然性存在方式。书中提出了后人类症候的四个方面:“生命的本质不在身体,而在信息;意识对人类进化起次要作用;后人类认为身体并非自然物;人工智能机器和科技装置与生物有机体无本质差异。”^[2]从马克思主义哲学视角看,后人类的存在就是一种对人类和前人类的“否定之否定”。在未来的后人类主义宇宙,人类结合义体的赛博人将是后人类时代的主体性存在方式。后人类社会主体性的消解是一个引发特别关切、具有深刻现实影响的问题。

“祂”指超自然的上帝等神明的存在,马克思在批判宗教时指出,“人创造了宗教,而不是宗教创造人。就是说,宗教是还没有获得自身或已经再度丧失自身的人的自我意识和自我感觉”^[3]。因此,宗教是人意识中的东西,是颠倒的世界,是人类内心深处的渴望与期盼。鉴于此,“祂—它”关系的呈现即是上帝等超自然力量映射下人类意识的信息化,在这个范畴内,基因编辑技术对人类智能的改写所引起的意识的转换、上帝角色在人类意识中的切换,以及《黑镜》中所展现的人的意识的可提取性与信息化、数字化解构与复制的过程就是人类意识实现信息化解码的过程,人类意识的信息化也是后人类的一大辨识性特征。直白地说,“祂—它”关系的呈现就体现为人类通向后人类的过程,就是人类失去自我、失去意识的能动性而开始自我泛化与空洞化的过程,这既是丧失主体性的开始的结束,也是人类独特性存在价值的结束的开始。

(一) 信息化意识的可提取性展现

第一,体现于“意识转移”,即意识的可提取性与可复制性。意识的可转移性作为《黑镜》中宣扬的后人类群体性的一大特征,相较于目前科技的发展状态,是一种基于社会实践的发展态势,是正在进行的、必然会萌发的未来时态,是社会意识对于社会存在的能动性预测与反映机制的发挥。

基因编辑婴儿事件的迅速发酵和饱受争议说明,以基因编辑为代表的科学技术的发展必须被限制在经过广泛认同的伦理和法律的规定框架内,才可能避免人类和人类社会结构被彻底瓦解的可能性。基因编辑可以通过改写基因剔除人类生理心理缺陷以改变人类外貌、性格,甚至意识能动性,人类在变得更完美强大的同时,人类的生物性和文化性的结构序列也随之被改变。“后人类”代之以自然人主宰世界,人类对象化、客体化为被奴役、被淘汰的类存在。我们有理由相信,科幻作品中的景象并非一种遥不可及的远景或者幻想。“基因编辑婴儿”的出现已将幻想迅速推进,后人类与人类比肩的情景若隐若现。后人类主义社会,以科技为主导力量的工具理性借助具象化的机器,发挥其对人类意识的

控制与规训作用,更揭开了隐匿其后的资本主义消费主义的意识形态统制功能,从根本上改写、甚至是剥夺与攫取人类意识能动性的发挥与施展,从而在本质上否弃了人类主体性。早期的西方哲学学派诉诸于历史合理性手段引证资本主义制度存在的合法性,充当资本主义消费主义的卫道士,为资本主义经济和科技合理性助力,就这点而言,反对资本操控下的科技至上主义就是在维护人类主体完整性与意识完整性,正如卢卡奇所预见的那般,科技作为工具的合理性发展会招致人相对于实在的物的作为客体的对象化存在。

《黑镜》第四季最后一集《黑暗博物馆》,这是继第四季更新以来,评论最多的一集。这一集由三个小故事入手,其中之一讲述的是一个妻子因故不幸成为植物人,她的丈夫接受了一名医师的“意识转移”实验,同意把妻子的意识“放入”到自己的脑中,这样就使得夫妻二人开始“共享”过去几十年的人生经历。但人毕竟是具有独立意识的高级动物,随着新鲜感的流失耗尽,原本充满温情的陪伴就转化为敌对的相互监视,在故事中,丈夫同妻子在思维方式上的差异最终导致了两人的疏离。其后,丈夫找到了新的女朋友并十分介意妻子意识的存在,最终选择把妻子的意识移植到一个具有特殊装置的猴形玩具中,妻子的意识得到永生的同时却失去了一切行动能力,妻子永生永世逃不脱被囚禁,这是一种极度反人道主义、同民主自由原则相背离的残酷暴行。当人类意识可被复制、交易和商品化的时候,尽管实现了人类不死的梦想,却如同打开了潘多拉魔盒,放出更多、更棘手的恶魔,比如模拟意识是否能够得到符合社会规范的有效控制、自然人与赛博人在参与社会实践活动时是否应当得到相同的待遇等问题。影片中所昭示的意识可提取之后带来的限于个体微观层面的景象只是冰山一角,现代技术伦理操控下的意识的可复制性将突破伦理底线,模糊人的自我定位与认知,危及人类尊严,引发一系列的公平性问题。

第二,体现于一种内化的“赛博修辞”,这种修辞呈现为一种自洽完整的逻辑结构,取消任何的外力介入。《黑镜》仿佛拥有上帝之眼能够洞悉人类社会的未来境遇,其故事情节看来是荒诞的无稽,直到基因编辑婴儿事件的出现。即便在这个意义上,《黑镜》也走得更远,其穿过了基因编辑婴儿的初期试验景象,对“露露”和“娜娜”们的时代给出了未来场景预构,这种未来场景让人不寒而栗。

在《黑镜》中,一位医师在人体上实验痛觉共感、意识转移等技术,组成了第三个小故事结尾中惨无人性的“无限电刑”,那位因为谋杀了气象主播被处置电刑的囚徒被医师哄骗转移意识,以不可逆的肉体丧失为代价获得永生,保留的只是思维和感知能力。医师把上述两项前沿科技相结合,让囚犯被物化、数字化和信息化的意识一次次接受电击,濒临死亡痛苦,不免让人想起著名的米尔格伦实验。剧中参与“施暴”游戏的参观者置身事外且乐此不疲地参与观摩,在电击囚犯结束之后都会获得一个“纪念品”,这个纪念品就是囚犯死亡瞬间意识的复制与改写。这种对生命和意识进行信息化与数字化处理的叙事内涵,进而形成了后人类主义的“‘赛博格修辞’:披露异常—确认异常—修补异常”^[4]。这个场景中接受施暴的意识是人类的意识吗?围观施暴游戏的群体又是否在映射彼时人类的无奈与无力,是否在暗讽当下人类应对基因编辑婴儿事件的麻木与冷漠?对信息数字化的“义识”失常的暴露就是对技术漏洞的揭露,数字化、信息化的“义识”^①频繁地接受凝视、被施虐、被确认即是数字化的工具理性的一种具象化和实体化自我修复的过程。可见,人类对于科技至上主义的盲目追捧是人类自

①“义识”,笔者用以表示赛博格化的意识,即数字化的意识,意同“义体”“义肢”等概念。

我戕害的关键,科技带来的日益便捷的生活方式是消费主义社会人们的精神鸦片与麻醉剂。如此,人们的生活态度愈发严苛残忍,对于同胞间、代际间的相互倾轧常常熟视无睹且等闲处之。科技的资本化充当了资本主义统治和压迫全人类的刽子手。卢卡奇早就指出:“当科学认识的观念被应用于自然时,它只是推动科学的进步,当它被应用于社会时,它反过来成为资产阶级的思想武器。”^[5]

剧中,观众凝视义体化的意识,正如当下的人类凝视基因编辑婴儿“露露”和“娜娜”,正如未来人类凝视后人类社会,个体目睹自我的媒介化、赛博格化,纵使媒介内化的结果令人忧虑。人类发展科学技术是将其视为人类的代偿机制,期望科技能够规避风险,使人得以从改造自然的朴素劳动中解放出来,但“这种逃避本质其实是一种让渡,即把身体某一部分的功能让渡了出去”^[6]。这种让渡意味着肉体趋向工程化与机械化,个体接受肉体工程化、机械化变更的同时,即是自觉不自觉地默许了个体与机器的“同质化”,也就是认可了个体的赛博格后人类化,若不警醒地意识到此次基因编辑婴儿事件的严肃性,人类将陷入身份和历史危机。“它”,即信息化、数字化代表的后人类主义赛博格,用数字化、信息化的科学技术转移和替换意识,目的就是获得人类的永生,实现“人定胜天”的古老传说与终极愿景。与此同时,人类也就被迫承受后人类时代被边缘化的命运。由此观之,《黑镜》是对当下人类生存境遇的戏剧性呈现,是对人类社会未来发展图景的预构。

(二) 信息化意识的模拟性展现

基因编辑技术在实现了人类意识的信息化提取后,便是对人类意识进行信息化仿生模拟,最终实现完全复刻人类意识。资本社会科技至上主义符合技术合理性原则,却违背了价值合理性原则,暴露了自身强烈的阶级偏好与价值偏好。正如卢卡奇多年前的警示,科技之于自然,科技是实践和人类社会发展的助推器;科技之于社会,则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吹鼓手,在这层意义上,此次基因编辑婴儿事件则打开了潘多拉魔盒,有可能引起资本重新回归基因科技领域迎合市场对基因编辑婴儿甚至定制婴儿的追捧,进行热钱投机炒作。科技勾结资本参与商业炒作,将招致科技非法滥用以及更大的医学伦理和社会不公问题。此外,资本通过科技消费主义社会的符号化趋势和象征法则对个体施加心理殖民。在社会编码的程式中,不断制造出欲望,又刺激科技的发展进步,这种情况下个体心理感知能力日益降低,虚无随之而来。在这层意义上,《黑镜》试图表达的是,在资本社会科技消费主义下的后人类社会,除了放逐与虚无,更能彰显主体真实性的是死亡,而这正是借助于科技对人类意识的模拟性复活与展现后的强烈不适的映衬下体现出来的。

《马上同来》中,女主角的男友意外死于车祸,她在无尽的痛苦中偶然发现一个软件,这项技术根据死者生前发布的所有信息进行仿生模拟,包括他的意识,这也是赛博格人之一。人工智能男友比真实的艾什更加“艾什”,不仅年轻帅气,有同样的趣味,而且完全听从于玛莎。“艾什”的完美和顺从,却让玛莎总有难以言说的断裂之感。“艾什”对玛莎的言听计从时刻提醒着玛莎:真实的艾什不是这样的。这样的错位使玛莎从艾什的非实体性存在感觉艾什在玛莎精神上的实体性存在,也就是通过不断地、清晰地意识到艾什的死亡来逆向感知艾什的存在。

主体从断裂的现实到欲望的满足,在信息化处理中得到满足的同时,却不断异化,直到达到特定的节点,才凸显主体存在的征兆。《黑镜》将资本社会科技至上主义操控下的、在通向后人类主义过程中的、人类群体性的悲剧命运,缩影于主人公个体的生存境遇,在电影艺术上既充满了戏剧性的冲突与张

力,更在深层次的警世层面,以通俗、具象的方式呈现出来,引发人类对资本科学技术价值的共同反思,进而道出了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的深层忧虑。

基因编辑婴儿的尝试无疑是危险的,通过《黑镜》,更加确证了人类意识可克隆性的危险性。一方面,科技不断突破物与人之间的界限,人类感受到科技对人类的靠近、直接接触,甚至侵入人类肉体,最后俘虏人类灵魂却不自知,更加危险的是人类怀着“无限抱拥”的姿态将这种科技高度发达视为科技对于人类文明进步所做的贡献而大加颂扬的应对态度。人类在潜移默化中丧失了对科技同化能力的识别与阻遏,直到基因编辑婴儿事件的发生如响雷般唤醒人类的神经;同时,也应当看到,对自我意识与肉体实在的传统认知也在悄然发生着转变,后人类的赛博格主义已经成为人类的一种可能的生活方式。另一方面,人类的肉体可以通过科学技术来实现保存和更换,人类借助于各种先进的医疗器械和科学技术大幅度提高了自身的平均寿命。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意识的模拟性再现,从另一个角度来理解,实则是人类永生的实现。然而,人类永生这个听起来令人难以置信的乌托邦式理想的实现会产生一系列的伦理和道德问题。人类该如何定义自身的存在形式?赛博格化的人是否能被归属于人类范畴?这成为一个重大伦理命题。不同于以往人类社会暴力残忍的被动式自然选择的进化方式,后人类主义在对后工业时代的大机器意识形态的批判中达致了一种积极的自我选择进化,但这种进化过程中需要注意哪些伦理问题?后人类主义批判人类自然崇拜和宗教崇拜,反思宿命论哲学,试图依靠科技与理性解放人类于自然和宗教对心灵的统治中,却暴露了后人类主义的科技崇拜倾向和对科技乌托邦的盲目性思维,这两方面又该如何达成共识?

三、“我一它”关系的实现:马克思主义的后人类学解读

基因编辑婴儿事件的发生让国内外各领域纷纷反思一个问题:人类究竟应当采取何种方式和姿态面对即将到来的后人类社会才是正确的选择?面对超科技泛化和科技霸权带来的这种喜忧参半的、充满不确定性和不可预测的后人类社会,马克思主义为人类正确应对后人类社会发态势提供了良方——马克思主义在价值和工具的双重维度中实现了逻辑自洽。在价值属性维度,马克思主义中内涵的自由解放的理想王国,指认了其乌托邦式的价值属性;在工具属性维度,马克思主义又享誉于其现实的、客观的、面向未来的、针砭时弊的批判功能,从这个角度而言,马克思主义又具有反乌托邦的科学性。《黑镜》反思人类现存境遇的反乌托邦性质与马克思主义不谋而合,深度揭示了人类和后人类主义的过渡与实现形式,同时,此次基因编辑婴儿事件的发酵也提醒人类,在应对自身和科技等不断异化与反异化过程中,应当在秉持什么样的伦理和道德底线的条件下实现对后人类的身份认同。

(一)马克思主义科技观的价值立场:反乌托邦主义

基因编辑婴儿事件引发的全社会的齐声质疑体现了当代科技共同体的反乌托邦、实事求是的态度。乌托邦是指“空想的城邦”,在社会思潮后来的演变中,也出现了“反乌托邦”呼声。有一系列的文学作品虚构出了反乌托邦思想的世界,包括乔治奥威尔的《一九八四》和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等。《黑镜》正如乔治奥威尔的《一九八四》,其不仅是一部传统意义上的人权主义小说,而是影射出资本力量联姻科学技术,对人类的思想与肉体施加密不透风的统制力的一部极具前瞻性和时代穿透力的艺术作品。它和基因编辑婴儿事件的社会价值还有一个共同点——对人类中心主义的复唱和人类生物性、

文化性的复归的愿景与企盼。《黑镜》所映现的后人类时代的边界,无非就是资本与技术相结合,从对人类实行朴素的、消极的体外统制力,流变为植入人体内部而窃听、复制和模拟人类的思想,对人类实行本质上的、绝对的统制力。

柏拉图认为,理念世界是第一性的,感性世界是第二性的,艺术作品当中虚构的艺术世界仅仅是第三性的,是现实“影子的影子”和“真实之间隔着三层”。《黑镜》作为一种艺术形式的意识形态,实质上是基于当前社会存在状况和科技发展方向、对未来人类文明在观念世界的一种合理预测与镜像反映,是对资本同科学技术联手操控人类、扼杀人类精神自由的状态的一种体认和揭露,是对资本社会科技至上主义发展新形态的反抗。《黑镜》从艺术批判的视角动态演绎了利用基因编辑技术克隆人类的未来图景,回应了基因编辑婴儿可能引发的伦理危机之维。

在基因编辑婴儿事件所招致的各界声讨焦点中,可以发现其中对信仰理性至上主义的人文主义与信仰科技至上主义的反拨和扬弃。就人类理性和人类本体性较早进行反思的是马克思和弗洛伊德。马克思在著名的《德意志意识形态批判》这本小册子中批驳了崇尚非物质的人类理性的人文主义哲学流派,主张人类主体性根植于客观物质存在,并随着客观物质条件而改变;而以潜意识理论为代表理论成果的弗洛伊德则在马克思的基础上,认为人类实践活动的驱动因素包括非理性的动物本能。面对科技之于资本统治人类的未来景象与推波助澜的后人类主义症候,《黑镜》的态度是明确且颓唐的,这体现在剧中人物面对困境时表露出的无力感:无力拒绝也无力斗争,《黑镜》也正是通过这种晦暗的方式和逆向思维试图唤醒人类的感知,人类必须停止基因编辑克隆人类自身的画地为牢式的短见行为。

作为当下和对后人类未来的预构,作为对基因编辑婴儿事件的具体回应,《黑镜》是对“科技乐观主义”的叙事宗旨和程式化、刻板化的人类中心主义、理性至上主义叙事主题的反叛,是一种反乌托邦式的影视叙事话语,它不拘一格、别开生面地独辟蹊径,把重构人类中心主义思潮带回讨论中心。《黑镜》一反常态地站在资本社会的对立面,挑明了消费社会麻醉大众的乌托邦本质,揭开了资本消费主义蓄意对人类自我革命性施以麻痹与阉割的真相,是对资本势力与科技力量私相勾结以按压人类自身的反抗。《黑镜》就是在拒抗资本与科技异化的反乌托邦过程中,反向论证并实现了人类自身“我”与后人类“它”的身份认同,同时为后人类化的程度规定了底线与原则。

(二)“后人类”的身份认同

贺建奎事件引发的强烈反响和社会不适反映了人类社会对于人类在基因上或意识上向后人类身份过渡、实现身份认同的强烈不适与拒绝姿态。那么,该如何合理利用科技实现由人类向后人类的身份过度?有学者指出,实现后人类的身份认同的路径可分为三种,“一是借助基因工程或无性繁殖(克隆技术);二是通过技术种植或人工种植;三是利用虚拟技术制造虚拟主体、改造现实主体,将虚拟世界和现实世界、虚拟人和现实人合二而一”^[7]。在这个过程中,人的边界感变得不甚清晰,自然人的古老概念被迫重写,透过基因编辑婴儿的伦理危机可以清楚辨明上述言论内含的潜在危机与谬误。马克思指出:“只有在现实的世界中并使用现实的手段才能实现真正的解放……当人们还不能使自己的吃喝住穿在质和量方面得到充分供应的时候,人们就根本不能获得解放。”^[8]这里的“现实的手段”便是作为改造客观实在的工具性指向的科学技术,以及基于此的社会实践,这也是科技最基本的功能取向;更重要的是,科技的最终价值旨归应当是,在促进社会历史发展的运动中,解放人类于无休止不停歇的体

力和脑力劳动中,而不是在解放人类肢体的同时将人类重新置入精神囚牢。《黑镜》无比生动而不乏深度地为人类描绘出一幅充满视觉快感与警世价值的未来“社会”景象,但遗憾的是,它并未针对如何达成从人类到后人类的身份认同给出提示。

第一,人类必须在自失的此岸与自圣的彼岸间搭建起沟通桥梁,寻求二者的协同。人类的自圣与自失是资本理性主体的非理性摹写。尼采曾说“上帝已死”,这既为科技霸权代替宗教伦理提供了论点,也同时为超人种主义的赛博格人类异化,以及代替人类自圣为现实的上帝提供了论点。通过基因编辑等科技手段,在人类亲手锻造出赛博格人成为后人类的上帝时,人类与此同时被对象化、边缘化,代之以人类成为世界的主宰者,体能和智能均经过科技改造的后人类异质于自然人,在全部人类还未彻底“进化”情况下而强行进入后人类,也就是说,只要还有一个自然人存在于后人类世界,这个自然人就将屈服于赛博格的统制。因此,人类必须在自失的此岸与自圣的彼岸间搭建起沟通桥梁,平衡二者关系。一方面,人类自身的存在形式发生变更,人类的生物性也随着媒介(技术)的植入,在增强改造外部世界的能力的同时,也触发了自我定位与自我认同的模糊与缺位;另一方面,科技的无限扩张,最终将控制与压迫人类的主体性和能动性正向发挥,不断侵蚀、占据人类肉体 and 灵魂空间,不仅如此,如马尔库塞所言,科技在商业营销的粉饰之下经过资本炒作,其工具理性的纯粹性和中立性丧失殆尽,科技扩张被误读为科技发展,其逆向冲抵了人类对于工具理性的批判能力,潜移默化地对人类的主体想象力与理性施加负向压制力,巧妙窃取了其存在扩张的合法性与道德性,人类的思想和精神自由的空间将被压缩,直至彻底扼杀,人类沦为单向度的人。鉴于此,人类必须克服自圣与自失的极化状态,在观念和理论层面首先架起促进二者协同的桥梁,为开启未来人机嵌合、实现身份认同奠定基石。

第二,发挥马克思主义价值理性对工具理性的自觉辩证的规训与制衡作用,克服资本和科技的极端主义化。资本理性的霸权是资本主义制度理性的非理性产物。资本社会工具理性实则并未兼具自我调节的能动性,若脱离了价值理性对工具理性的规约,人类终将沦落为工具统治下的无灵魂式存在。基因编辑婴儿的试验从长远而言,是对人类追求自由机会和谋求平等意愿的无情抹杀。科学通过基因选择和编辑完全克隆人类,未来的每个“人”像机器一样被事先设定好后准予“出厂”,人的可能性的减少和丧失,意味着未来选择的可能性的单一化和无聊化,意味着人类选择的自由权利的丧失。基因编辑婴儿人为进化基因的初衷如果达成,将吸引物质基础较好的个体投入大量的利益博取更高素质的后代,这将加剧社会不平等,同时市场需求吸引资本炒作加剧矛盾锐化。后人类社会,科技的改造功能即科技初始的劳动性弱化,而统制功能即资本性强化,从而引发了科技片面化和抽象化发展趋势。科技的抽象化、超级化、泛化发展固化甚至钝化了人类主体性特征,软科学与硬科学相结合,软技术与硬技术联合统制下的人类与人类社会,其整体呈现为全景敞式的工厂车间。劳动的理性化安排^②将劳动者禁锢于特定的时空里,人类无一例外地成为依附于资本统治的、恪守职责的高级工人,沦为社会化大机器的齿轮,人类这种自囚困境也提醒自身,工具理性的发展逻辑必须得到遏止,科技至上主义的蔓延必须得到控制,克隆人类、试验人类意识的行动是非正义的和违背人类伦理道德的。因此,发挥马克思主义价值理性对工具理性的自觉辩证的规训与制衡作用,认真检视科技的无限度扩张,同时明确辨别

^②劳动的理性化安排包括劳动时间和劳动内容的理性化安排。社会学与统计学机理之上的劳动时间与劳动内容的确立与更新是软科学与软技术的体现,软科技为顶层设计与制度安排提供遵循,硬科技作为一线改造力量从属于软科技——作者注。

资本与科技结合的文化工业对人类思想和精神产生的消弭作用,深刻认识并及时控制资本社会文化工业的精神鸦片性质,制定科技发展的伦理底线,完善伦理监管程序,同时培植成熟的科技共同体以束缚科研的不审慎、不道德行为,实现向后人类有底线的进化的认同。

四、结语

基于功能等价意识基础,赛博格化主义显露出强大的辩证矛盾。一方面,人类利用科学技术批量化生产机器,以辅助人类的日常生产活动,改善人类生活品质,努力将人类从改造客观事物的困顿中解放出来;另一方面,人类又忌惮于科学技术的过度发达与失控,从而导致人类最终奴役于科学技术并由此堕入无边的邪恶与黯淡。只有平衡二者关系,为科技发展规定伦理原则和道德底线,并规范化、严肃化基因编辑试验等围绕人类意识的、危及人类本体性和生物性的科技实验的伦理监管程序,同时培育成熟的科技共同体队伍以发挥监督作用。“科学从社会中汲取供其发展的滋养,同时也会为了获得这些滋养而遵循社会规范或者清理科学共同体内部冒犯规范的个体”^[9]。需要看到,贺建奎宣布基因编辑婴儿的试验成果后招致了国内外科学界的批评与质疑,同时,域内外科学界自觉在第一时间商讨应对办法,这恰是科学共同体应对突破伦理底线的科研和科研人士的挽救方式。

回顾科学技术的发展史,人类对从工具式的附属存在到科技将人类功能化和赛博格化后获得地位的擢升的定位说明,任何低估资本和科技力量的思想和行为都是危险的。布鲁克说,“技术是毒品”,技术就像是毒品一样,释放出强大的力量满足个体需求,但药效过去又会使人陷入虚无,同时它致人上瘾、侵害个体生命的副作用又不同小觑,这正如科技至上主义的效能。因此,时刻保持清醒与审慎的态度,有必要重新反思科技的目标和价值,明确界定内涵和外延,培养敬畏自然、敬畏生命的意识,推动基因编辑技术朝向马克思主义价值理性的方向健康发展,这是人类的历史使命,是人类不致滑入危险境地所要采取的必要措施。实现人类同后人类的和解,建构身份认同,必须将科学技术剥离于资本的股掌,解放科学技术,回归科学技术为人类服务的初衷,厘清科学技术的基本价值取向,培植一批成熟的科技共同体,实现技术同人类的有机结合,这是此次基因编辑婴儿事件,更是《黑镜》所试图传达出来的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后人类时代,如何寻求主体存在方式的最优解以及如何实现“人”和“机器”的体现底线意识的有机契合。

艺术是现实的写照。《黑镜》的批判性和前瞻性宣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批判的精神品格,它从资本和科技充当媒介主体,将人类对象化、他者化、原子化的存在状态出发落脚到后人类主义的价值体系,是对这次基因编辑婴儿事件引发的对人类价值和伦理的挑战的深层次、前瞻性的回应。《黑镜》并没有以映现令人眼花缭乱的未來科技为创作归宿,也没有自我标榜科技乐观主义与人类必胜的传统宇宙观,而是义无反顾地抛弃科幻作品的宏大叙事,直面人类生存境遇的被动状态。从这个角度而言,《黑镜》的叙事价值不仅在于供观众娱乐消遣的商业性,更在于其对人类未来身先士卒、敢为人先的艺术批判性。《黑镜》站在哲学批判的高位,启示我们重新审视科技的目标与价值,引导人类为科技的发展完善和健全伦理监管底线,积极思考人类应当如何在妥善处理科学技术的发展中实现自处。

参考文献:

[1] 林萌.后人类生存境遇的影像呈现——论英剧《黑镜》的现实隐喻[J].北京社会科学,2018(4):42-52.

- [2] 林建光,李育霖.赛博格与后人类主义[M].新北:华艺学术出版,2013:95.
- [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
- [4] 何梦云.可见的赛博格《银翼杀手》:“后人类身体”的电影造型[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15.
- [5] 卢卡奇(LUKACS G).历史和阶级意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研究[M].张西平,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89:13.
- [6] 马克斯·莫尔.超人类主义——一种走向未来的哲学[M].张立英,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4:46.
- [7] 张之沧.“后人类”进化[J].江海学刊,2004(6):5-10.
- [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368.
- [9] 贾鹤鹏.基因编辑婴儿事件发生,是否意味着科学发展不可控?[R].微信公众号“我是科学家 iScientist”,2018-12-06.

The post-human syndrome of Black Mirror from Marxist perspective: A viewpoint of gene-edited infants

ZHANG Yan, ZHAO Xinshu

(School of Marxism,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28, P. R. China)

Abstract: He Jiankui's gene editing infant incident stirred up a thousand waves, which triggered the attention of the media and people from all walks of life at home and abroad. The doubts are generally out of grief for the future of mankind, focusing on the issues such as ethics and morality, human structure, social order breakthroughs and nuisances. This article takes this incident, as a perspective to explore the underlying causes of the outbreak of the incident, from the standpoint of Marxism, to analyze the post-humanism representation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mbining to human beings as well as what human kind should do to face its constant occurrence and how to adjust itself when post-humanism becomes an irresistible trend. Post-humanism takes the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s the first traction and has an impact on the item of human being. This involves the consciousness of “human” under the vision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the ontological issue of human physical boundary and self-identity, which covers anthropology, sociology, ethics and other fields. The continuous fermentation of genetically edited infant event reminds humans that we must address this realistic and theoretical problem and rewrite the outline of “human”. This article will focus on the dimension of critique of Marxist philosophy, the story core of Black Mirror, and combine the genetic editing infant event. By analyzing the presenta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of “You-It” and “He-It”, it will be explained that characteristics of the post-human society is the subjectivity and generalization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which the beings show up with conscious and physical cybernetic characteristics. This article hopes to provide some insights for tackling the ultimate arrival of post-human society and the organic realization revealing of underline awareness of the “I-It” relationship.

Key words: gene editing; Marxism; Black Mirror; post-human; cyborg; science ethics

(责任编辑 彭建国)